

司马迁与班固的民俗观比较

——从《史记》、《汉书》的史俗记载切入

李国江

(东营职业学院, 山东 东营 257091)

[摘要] 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史的过程中,以史学家的眼光,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一些非正统文化的因素,广泛搜集并记述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多方面的民俗事象,体现了史家论俗的眼光和意识。同时,二者在对民俗及其功能的认识、民俗与地理环境关系、礼俗及乐俗的见解等方面又形成了各自的民俗观,推动了我国民俗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司马迁;班固;民俗观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3)05-0039-05

司马迁和班固分别是西汉和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们所处的两汉时代,正是我国大一统帝国文化奠定的时期。政治上,经过了第一个统一的秦王朝后,大一统帝国得以持续巩固和发展;文化上,中国的文化也经历了重心不断迁移的夏商周三代、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的春秋战国、文化同一的秦王朝后,逐步形成了独尊儒术的中国本土文化体系。自此儒学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统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同时,这一时期民间传播的诸如五行观念与谶纬学说也逐渐与正统思想相埒,形成了彼此对抗、改造和创新的文化结构,正统与非正统两种文化都很活跃,文化面貌的世俗化形态和学术的世俗化倾向日渐显露。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撰史注经,还是搜神志怪,大都吸收了一些非正统文化的因素,文人学者或使用,或编著先秦汉魏的民俗资料,都拓宽了范围,增加了数量。在史学、哲学、宗教和农学等一批新兴的学说中,评注民俗事象,渐成风气。^{[1]398} 总结我国古代学者在著书立说中对民俗资料的记录和保存,主要可分为三个层次:一类是以民俗为对象所进行的专一的搜集和保存;一类是以记录民俗为主、兼顾其他的搜集记录;还有一类是创作中使用大量或较多民俗资料进而由此保存了较多古代民俗的古

籍著作。^{[2]98} 司马迁和班固即是第三类的突出代表。司马迁和班固在著史的过程中,搜集、记录和运用了大量的民俗风情材料,包含了多个方面的民俗事象。他们在载史叙事当中,通过运用史俗杂陈的材料写出了对民间习俗的深入观察和理解,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民俗见解和认识。以下结合《史记》、《汉书》所记录的部分史俗材料及其反映的民俗事象,对二者的民俗观作以归纳和比较。

一、司马迁的民俗见解

汉代史书,以《史记》为先河,开创了我国史学的新时代。全书计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总结了自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在写述历史的进程中,包容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对不同人等的记述和描写中,广泛地反映了世态人情、物产民风、礼乐规仪和应物变化,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俗学资料,搜集和记录了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在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1]39}四大范畴方面都有涉及。司马迁对于民俗的见解也借此得以体现。

[收稿日期] 2013-02-30

[作者简介] 李国江(1973-),男,山东东营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山东省东营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的研究。

1. 民俗可以补史、助史。民俗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史书的撰写不能不牵扯到诸多民俗事象。尤其是在缺乏史家实录的地方,民俗事象的搜集和使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司马迁在《史记》的撰写中,“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吸取和运用大量的古代神话、古史传说和民俗资料,来填补史实的不足,补充叙述历史的发展过程。这较集中糅合在《五帝本纪》、《殷本纪》、《夏本纪》、《周本纪》中,如轩辕“教熊黑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传说(《五帝本纪》);鲧禹治洪水的传说(《夏本纪》);“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传说(《殷本纪》);“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欣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其而生子”是为弃的传说(《周本纪》)。司马迁把这些神话和传说作为材料组织到帝王本纪中,用来说明三皇五帝和夏、商、周各代各族族帝的来历,在填补史实不足的同时,提供了广泛的上古民俗现象,在记录中包含了始祖、发明、争战以及感生等多方面的神话和传说。

历史的真实性要求和变迁性原则,又让司马迁意识到民俗风情助益于写史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他看来,要分析现实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就应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对推动历史变化的各阶层、各方面人物和社会因素加以记录。他认识到随时代变迁的民俗现象,可以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变迁,因此,他的这一见解助使他材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在《封禅书》中记录和描述的各种巫祝活动和祭法,展现了汉初及以前的祭祀历史和风貌。此外,《天官书》中对我国古代历法的记述,在提供了丰富的民俗材料的同时,勾勒出我国历法之兴及其演变的轨迹。另一方面,历史真实性的要求,也使他产生了“立俗施事”的见解。他把“史”建立在活生生的“俗”的基础上,把“俗”写进“史”,从而体现出他关于民俗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认识。

2. 民俗因地域而有别。司马迁在写史中,注重民俗风情的地域之别,强调地理物产和风土人情的密切关系,从而把民风民性的形成归结为地域环境使然。《货殖列传》详细记载了我国不同地域的物产与民风,“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因而其人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陇蜀之地多商贾,汉都长安又多四方之人,所以其民好取巧而不务根本。巴蜀土地肥饶,盛产姜、丹沙、石、铜、铁、竹、

木,可远运云贵,常以他之所多,换己之所缺。甘肃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此三河之地在天下之中,土地少,民人多,所以其俗纤俭。而石北地边,常受胡寇侵扰,其民好气任侠,不事农商。靠近北夷之民,性剽悍,其俗犹有赵国之风。处在其间的上党(今山西)、中山(今河北),地薄人众,民俗悞急,仰仗机利而食,悲歌慷慨。”^[3]司马迁在概括和评述了不同地域的地理物产与风土人情的基础上。将地理物产和民风民性的关系做了精当的概括: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饥馑之患,所以无积聚。因此,江淮以南的人,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而沂、泗水以北宜种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多,常遭水害,所以好蓄藏。

另外,司马迁在对异民族习俗的记录和描写中,也注重突出了地域的区别。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忽略对这些边地民族历史的记录,并在记录这些边地民族的历史中,包含着大量的民族民俗史料。在《朝鲜列传》中叙述了朝鲜王满的传记,在《南越尉陀列传》中则叙述了南越尉陀其人,从中透露出某些习俗心理和行为。而在《西南夷列传》中则将从巴蜀黔中到滇之南夷、西夷的民俗做了最充分的展现。如“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其俗或土著或迁徙”,^{①[4]}(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2991页)“秦时常頽,略通五尺道,……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荏马、魃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4](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等等。《匈奴列传》对匈奴故俗记述更为全面,自生活方式、语言、饮食、服饰、礼俗诸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如“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氏”^[4](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79页)等社会故俗。当然,对我国中原以外民族文化和民俗进行记录的传统可以上推至《山海经》。在这本被后人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地方志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对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如肃慎、匈奴、东胡、三苗、羽民、豸国、氏人国等地的民俗事象的记录。^{[2]98}司马迁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对我国边地民族的习俗进行系统记述的同时,更体现了民俗差别的地域性。

3. 民俗可以助政的见解。在司马迁看来,民俗

① 文中标注参考文献[4]的均出自司马迁《史记》,具体卷、页码等见所引内容后的括号内。

风情有助于礼制的维护,从而有助于教化万民,辅助政治。据此见解,认为国家的礼仪之制是社会行为之准则,但要制定这种准则,必须采风俗。“采风俗,定制作”、“追俗为制”,他认为民俗是礼仪之制的根基。同时,他也十分重视俗与乐的关系,认为乐与政通,乐可辅政,但乐之所由来,乃从风俗始。乐是来自于民,取之于俗的结果。司马迁在《乐书》中记载,“以为川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音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移,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鸣叫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4](卷二四·乐书,第1175—1176页)这一记述表达了俗以制乐,乐以为治的观点,但根本还是从俗起,强调了“俗”的助政之用。

二、班固的民俗见解

《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的记述西汉一代的历史专书。它在《史记》的基础上开创了我国断代史的范例,它与《史记》相比,扩展了不少新的领域。《汉书》废世家入列传,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记述了西汉高祖至王莽新朝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从记述民俗的角度来看,《汉书》较《史记》又有很大的进步,更加重视风俗的记载和研究,其中以《礼乐志》、《食货志》、《郊祀志》、《地理志》最为重要。班固对于民俗的见解也多由上述篇章所记的史俗资料来体现。

1. 重视礼俗和乐俗的作用

《汉书》中有关礼乐民俗的材料集中体现了班固对礼俗和乐俗作用的重视。班固在《礼乐志》中反复论述礼俗的作用,提出:“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①[5]}(卷二十二·礼乐志,第949—950页)在班固看来,上述“婚姻之礼、乡饮之礼、丧祭之礼”,已成为了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礼仪之典

常,并上升到封建统治者追求礼仪之邦的高度来对待。班固认为“古之王以教化为大务”的做法,因而人人相因,认为“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便无可争。这集中体现了班固思想中对礼俗重视的倾向。

在重视礼俗的同时,班固在《礼乐志》中还记载有许多俗乐。如记录有刘邦定天下后过家乡沛县,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歌,做成的《大风歌》。这种记载反映了西汉重乐俗的风气。另有关于设立“乐府”,采集民歌的记载。汉武帝专门设立乐府机构,“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5](卷二十二·礼乐志,第964页)《食货志》记采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5](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1030页)上述记述反映了西汉时通过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班固正是通过从记载来自民间的俗乐以及设立乐府机构采诗以观风俗的角度,强调“乐”的教化作用。

同时,班固将礼俗和乐俗的作用一并看重,强调二者等同的作用,在他的论述中,是礼乐并论。另外,班固从“风俗移易”的观点出发,指出了礼刑与人性之关系,“由刑而俗,又由俗而制”,体现了他对刑俗作用的认识。

2. 地理民俗观

班固在《地理志》中,结合地理,载述了各地的民俗,展现了广阔的民俗事象。它按郡域地区,记述了各地的历史遗风,经历变化,民俗表现和原因,展现了我国各地的习俗,描写了其表象特征。《地理志》以秦地为始,着眼与天下十六郡,一一论及。例如对鲁地的描述,“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无)林泽之饶。俗俭嗇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5](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483—1484页)《地理志》对于地域间的相互影响也很重视,并有记述。如“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5](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487页)“上谷至辽东,地广民稀,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5](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479页)等等。班固在《地理志》的记述中,结合地理因素与条件,提出了对民俗的见解。构成了我国地理民俗观的代表性言论。班固提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

① 文中标注参考文献[5]的均出自班固《汉书》,具体卷、页码等见所引内容后的括号内。

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5](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466页)从水土风气、民常、民性方面概括了对风俗的看法,指出了水土风气、地理因素对民俗形成的作用,总结解释了“风”和“俗”的内涵,形成了自己对民俗的观点,尤其是其以“好恶习尚”为主来界定民俗的见解,突破了以“礼”定俗的囿范,成为论述民俗的根据。这一观点强调禀赋纲常、水土风气、取舍好恶,重在探求风俗之由来和风俗之不同。班固认为有什么样的水土,便有什么样的习俗。并以此观点为指导,对各地民俗、各地之所好及所恶皆从其与地理风土的联系上进行了分析。

3. 对民众民俗意识的重视

民俗意识与民众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居于民众生活的精神层面,集中反映了民众的民俗心理。班固注重民众信仰祭祀背后所蕴含的社会风尚和民俗心理,体现了其对民俗心意层面的重视。在《五行志》中,班固对民众信仰的“五行说”做了专门的记写。以五行为五方,代表五种事物,并与八卦中之方位相融合,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以五行之旺衰,状人事之克遂,再结合阴阳之说,构成了阴阳五行家的体系。其中以土为中央而生万物的观点十分重要,土得其性,则草木百谷熟,水旱之灾消,而民人得以养。西方金,万物杀气之始,属白,北方水,终藏万物,水性和阴阳调,魂气收,天时顺。用此说教,来解释各种事物。这种五行信仰的说教在当时的民众思想中影响根深蒂固。班固在《五行志》中,围绕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记载了上述诸多古代民俗观念。这些民俗观是基于民众对五行、阴阳的认识而形成的,构成了民众在此方面信仰的思想基础。《天文志》则是围绕“彗孛飞流,日月薄食”等自然现象,将星占及卜天时等融合进去,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民俗认识。如班固对星宿兆验人事和社会现象做了记述,如“岁星所在,国不可以伐”,“当居不居,国亡;所之(去),国昌,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凶,不可举事用兵。”^[5](卷二十六·天文志,第1163页)“荧惑出则有大兵,入则兵散,周还止息,乃为其死丧。寇乱在其野者亡地,以战不胜。东行疾,则兵聚于东方,西行疾,则兵聚于西方;其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5](卷二十六·天文志,第1164页)所以“荧惑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对于《史记》中早有记载的汉代非常重视的岁星、荧惑星、太白星、辰星、慧星,班固在《汉书》中又记述了

“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五星色皆圜白,为丧,为旱。”“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上述记载,是当时民众所持有的天象信仰的真实记录。上述记载所反映的民俗观中同样包含着民众许多重要的民俗意识,如天象与人事相联,星宿与国祚互应,构成了民众天文气象民俗观的思想认识基础。上述两个方面,都展现出班固对古代思想中民俗心意的关注。

三、司马迁与班固民俗见解的异同分析

1. 司马迁与班固民俗见解的相同之处

第一,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首先在内容方面,二者都具有广阔的民俗眼光,多处涉笔,对民俗资料的记录和使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俗事象涉及生产生活习俗、信仰习俗等等。都有对边地民族的情况及风俗事象的记录。为后世的民俗研究保留和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民俗资料。其次,二者在对民俗记录的同时,或体现或蕴含了对民俗的认识。阐述了某些风俗的起源、范围、作用等,都认识到风俗的地域差异,都认识到环境及物产对一地风俗的影响,指出了规范各种风俗礼仪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重视“移风易俗”对统治者治国安邦、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都指出了在民众的民俗信仰中表现的自然观、阴阳观等思想意识,阐述了民俗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广泛影响。

第二,从历史学的角度看,都具有史家论俗的眼光,将民俗资料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注重民俗材料所涉及的民俗事象的历时变迁,坚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原则,用民俗事象的变迁来叙述历史的发展过程,以民俗事象的发展变化勾勒出历史的风貌。

第三,二者在撰史的过程中,对民俗的某些见解有的一脉相承,如对礼俗、乐俗功能的理解。二者撰史都体现了很强的民俗意识,具备眼光向下的态度,注意吸收非正统文化的因素,关注下层文化,从而使其著作中多了世俗化的倾向。记史的过程中表达的民俗见解,既是对前世和当世民俗观念的总结和归纳,同时又在某些观点上有突破和创新理解,这些都对后世民俗的专门研究提供了观点上的依据和指导。

2. 司马迁与班固民俗见解的不同之处

第一,对民俗功能认识上的不同。司马迁运用民俗材料是填补史实的不足,从而将民俗功能从用以论政,转变到用以补史,在民俗功能的认识上扩其运用

范围。而班固对民俗功能的认识则是多以论政。

第二,司马迁认为礼俗是社会行为的准则,要制定这种准则,必须采风俗。他认为“礼由人起,礼由外人”。在《乐书》中,司马迁提出了自己对乐俗的观点,即乐来自风俗,采风俗,比声律又用以助政教,化兆民。其要旨是俗以制乐,乐以为治。他认为“乐自内出”主张要重视乐俗的作用。司马迁将礼俗和乐俗分而论之,但殊途同归,都是为政。班固则是主张“礼乐并论”。班固在《礼乐志》中表达了他的礼乐并论的观点,认为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去文帝以来风俗之流溢,不能靠官,而要靠礼乐之教化。

第三,对“俗”的认识不同。司马迁的所谓俗,是指民间的风俗,将其仍置于礼俗的囿范之内,偏重民俗的教化功能。班固则对风俗做了总结和归纳,明确了其内涵。班固认为,好恶取舍,动静亡(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班固的民俗则是以好恶习尚为主,突破礼俗的囿范,班固重在强调风俗的所由和所异。

第四,对民俗与地理环境关系认识之别。司马迁在举凡全国各地之俗后,强调了地理物产与风土人情的关系,把民风民性的所成,归结为所处地域及生产、货殖的结果,表现了对民俗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班固在《地理志》中,把各地民之好恶皆从其与地理风土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进一步阐述了民俗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地理民俗观,表达了更为明确的民俗见解,认为有什么样的水土,便有什么样的习俗。

第五,民俗理论论述之别。司马迁的民俗观,与其历史观紧密相联,他“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用以“自镜”,述往事与思来者贯穿一体。他既重视政治经济之史变,也重视物质与精神,人生与社会之

情状,对民俗物产,百工行业,人之性情均能互相联系,使得在探讨历史及国家政治兴亡变化的同时,能充分反映民生、民力和民俗。司马迁对民俗多采取广议散评的形式,并没有对民俗总体的认识进行理论论述。而班固则对民俗总体认识进行了理论论述,形成了某些较系统且有影响的民俗见解。

小 结

通过对司马迁和班固民俗观的归纳比较,可以看出,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史的过程中,以史学家的眼光,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一些非正统文化的因素,广泛搜集并记述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多方面的民俗事象。他们在记述中,对民俗事象进行评注,体现对民俗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民俗见解。这不仅扩大了我国民俗记述方面的范围,积累和保存了丰富的民俗史料。而且,他们对民俗记述的评注,在加深对民俗的理解和认识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我国民俗理论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2] 苑利. 关于我国古代的民俗观[M]//中国民俗学会. 中国民俗学年刊(1999),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3] 张紫晨. 中国民俗学史[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84.
-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5]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责任编辑:闫卫平)

A Comparison of Views on Folklore between Sima Qian and Ban Gu ——Through the Incisiveness of Folk Materials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an Shu

Li Guo-jiang

(Dongying Vocational College, Dongying, Shangdong, 257091)

Abstract: Sima Qian and Ban Gu both absorbed the unorthodox culture factors in their historical writings, they widely collected and described folk materials, reflecting folklore items in many aspects and embodying the historian's folklore consciousness. During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narrative, they formed their respective folklore view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folklore and its fun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custom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opinion on etiquette custom and folk music, etc. Thi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folklore theory in China.

Key words: Sima Qian; Ban Gu; Views on Folklore

